

外国剧作选

WAI GUO JU ZUO XUAN

6

上海立

外国剧作选

(六)

上海戏剧学院
戏剧文学系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江俊绪

封面设计：朱展程

外国剧作选

〈六〉

上海戏剧学院
戏剧文学系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南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25 字数 466,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书号：8078·3266 定价：2.15元

前 言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叶，是欧洲戏剧蓬勃发展并获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时期。同样，也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得到迅速发展和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欧洲封建统治，在许多国家引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广泛发展的新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一些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劳资矛盾开始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浪漫主义作家艺术家的理想，日渐暴露出它的空想性质，浪漫主义的文艺运动也随之走向衰落，批判现实主义逐渐成为欧洲文学戏剧中的主要潮流。

从十九世纪开始，崛起不久的俄国戏剧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戏剧文学的发展同当时俄国解放运动的紧密结合，是这一时期俄国戏剧独具的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使得艺术上日臻成熟的俄国戏剧，很快进入到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前列。

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的落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为迟缓。就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当时的俄国还基本上处于封建

农奴制阶段。随着农奴制危机的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断增长以及俄国人民觉悟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的阶级矛盾激化了，革命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但由于俄国资本主义本身还很软弱，又慑于农民起义浪潮此起彼伏，因此资产阶级还需要依附于沙皇政权来取得它的发展，壮大它的力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革命的任务就落到了十二月党人身上。1825年12月14日，终于爆发了由部分进步贵族军官组织的反专制农奴制的武装起义，由此开始了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一阶段，即贵族革命阶段。

与此相适应，这一阶段的俄国文学、戏剧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二、三十年代，以十二月党人作家（如雷列耶夫）和普希金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还相当盛行；而与此同时，现实主义的文学、戏剧开始迅速形成。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早期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都在社会现实的启示和推动下，逐步走上了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尽管初期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戏剧还不成熟，反映的生活面也不够宽广，但已初步显露出了批判专制农奴制的思想锋芒，表现了十分突出的讽刺倾向。就戏剧创作来说，代表作品有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又译《智慧的痛苦》，1824）、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1836）等，它们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俄国民族戏剧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十九世纪初期的俄国戏剧充满复杂的斗争。在官方扶植下，那些维护沙皇统治和贵族利益的所谓新古典主义戏剧（如贵族作家沙霍夫斯科依的喜剧等）曾一度活跃起来，它们与外

来的多属消遣性的通俗笑剧和传奇剧一道，曾经在舞台上煊赫一时，广为流行。但毕竟因其思想倾向的反动和形式上的浮华矫饰，没有多久就走向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俄国民族的现实主义的戏剧文学，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一项历史任务。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聪明误》一剧的出现，使俄国的民族戏剧向前迈出了第一步。在这出戏里，当时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革命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剧本猛烈地抨击了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批判了社会风尚、道德观念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弊端和恶习，鞭挞了上层贵族阶级的反动保守、灵魂鄙琐和生活腐化。格里鲍耶陀夫在艺术上的贡献在于：他在《聪明误》中采取严肃的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倾向和独特个性的典型形象，特别是对贵族社会中腐朽势力的讽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全剧基本按照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写成，尽管它已经扬弃了古典主义中那些抽象的纯理性的写法，但由于形式上还拘泥于“三一律”，毕竟大大限制了现实画面的广阔描写。

随后，相继出现了普希金(1799—1837)的历史悲剧《鲍利斯·戈都诺夫》和他的四个小悲剧《吝啬的骑士》、《莫扎特与沙莱里》、《石客》、《瘟疫流行时的宴会》。《鲍利斯·戈都诺夫》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以戏剧样式处理历史题材方面为俄国戏剧作出了范例，而且在于它标志着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戏剧中已经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正因如此，普希金不但是俄国近代文学的奠基人，而且是俄国伟大的戏剧改革家。普希金在戏剧创作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严格地用现实主义方法创造人物形象，善于在把握人物性格核心的同时，体现其本身的复杂性

和生动性；在戏剧结构上，他完全抛弃了古典主义的“三一律”，继承和发扬了莎士比亚戏剧保持情节一致而突破时间、地点限制的传统；在体裁上，他从悲剧中注入了喜剧的因素，为后来俄国正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语言上，他把散文语言和诗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使之接近民间语言，显得质朴而自然。普希金正是以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改造了俄国的戏剧，使俄国戏剧扩大了影响。

沙皇政府镇压了十二月党人后，为了从思想文化上巩固反动统治，扶持了一批卖力地为其效劳的反动剧作家，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库科里尼克和波列沃依。他们的反动浪漫主义剧作，与专门编造荒诞情节、追求离奇效果的通俗笑剧、传奇剧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霸占着当时的俄国舞台。

但是在三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也出现了莱蒙托夫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剧本，如《怪人》(1930)、《假面舞会》(1935)等，这些剧本充溢着对尼古拉反动时期黑暗现实和农奴制度的反抗精神。接着，很快又出现了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1836)和《婚事》(1842)、《赌徒》(1842)等喜剧作品，以及屠格涅夫的喜剧《食客》(1848)、《单身汉》(1849)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第一部喜剧《自己人——好算账》(1849)。这一大批剧作的涌现，使三、四十年代俄国现实主义的戏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果戈理的代表作《钦差大臣》，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果戈理对外来(主要是法国)的通俗笑剧和传奇剧风靡一时的现象早有反感，他渴望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他的《钦差大臣》猛烈地抨击了沙俄官僚政治的丑恶，真

实描写和深刻批判了封建农奴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而这一切又是以独创的喜剧技巧和强大的舞台魅力获得体现的，因而曾引起一帮贵族文人的咒骂和攻击，诬蔑他为专事“诽谤”俄国的“自然派”。但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先驱者、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1811—1848），热情支持并高度评价了果戈理创作的讽刺、批判倾向，指出果戈理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写出了精美绝伦的现实主义作品，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一个新的流派。别林斯基认为，从《钦差大臣》可以看到俄国戏剧艺术的未来；并说由此开始，将有俄国自己的民族演剧，将有俄国自己的演员和观众。事实确是如此，以果戈理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的确立，对于后来俄国戏剧文学乃至演剧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俄国民族戏剧开始形成的年代，也是俄国戏剧中现实主义得到巩固，最后完成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的年代。

五十至七十年代，是俄国封建农奴制经济面临崩溃，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农民起义运动更加高涨的时期。沙皇军队在1853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败，更加深了专制农奴制社会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鉴于因战争失利所造成的国力虚弱，又慑于大规模农民暴动的威胁，不得不于1861年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所谓农奴制改革，但这种改革的结果却是沙皇反动统治和封建剥削的加强。这一残酷现实从反面教育了广大农民，农民起义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正是在现实斗争生活的推动下，以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继承了四十年代别林斯基反专制农奴制度的战斗传统，以文

学评论为武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揭穿这个“改革”的骗局。俄国解放运动也就从1861年左右开始进入第二时期,即平民知识分子时期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革命特点,列宁指出,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在俄国开展了革命运动,而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个革命运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他们的圈子扩大了,他们与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纪念赫尔岑》在这一时期中,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取代了贵族革命家的领导地位,主张捍卫农民的利益,揭露“农奴解放”的骗局,号召农民举行起义,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俄国解放运动有了更为蓬勃的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既是杰出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哲学家,又是捍卫俄国文学、戏剧现实主义传统的优秀作家和文艺批评家。他们以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当时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文人所鼓吹的种种唯心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反动理论,进行了有力驳斥和致命打击,从而捍卫和发展了俄国文学、戏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传统。他们的革命思想和文学活动、对于同时代的乃至以后几代的作家艺术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作家涅克拉索夫(1821—1877)、萨尔蒂柯夫—谢德林(1826—1889)等人的评论活动,也对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有过一定贡献。

在十九世纪中叶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引、鼓舞下,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戏剧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相继产生了屠格涅夫、亚·奥斯特罗夫斯基、冈察洛夫、苏霍沃—柯贝林(1817—1903)和列夫·托尔斯泰等许多优秀作家。

就俄国的戏剧创作来说，前一时期出现的《聪明误》、《鲍里斯·戈都诺夫》和《钦差大臣》等固然是旷世名作，但毕竟还是一个个别现象。只是到了亚·奥斯特罗夫斯基等出现后，批判现实主义戏剧才蔚成浩大声势，在舞台上占领住阵地。六十年代前后，农民革命思想的空前高涨，使农民命运及其前途问题，成为社会上热烈争论的一个课题。从五十年代起便有所露头的农村题材戏剧，这时候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不少作品对于农奴制统治下农村的黑暗与落后，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但往往只停留在宣扬地主与农民阶级调和的道德说教上。只有剧作家皮谢姆斯基(1820—1881)的《痛苦的命运》(1859)曾以它较深刻的揭露性内容，轰动过俄国剧坛，被认为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问世前，反映农村生活的俄国剧作中最好的一部。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历史剧的创作也有较大发展，代表作品是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的历史剧三部曲：《伊凡雷帝之死》(1865)、《沙皇费多尔》(1868)和《沙皇鲍里斯》(1870)，它们以洞幽烛微的心理刻画见长，并对沙皇的专制统治有所针砭，因此受到当时进步人士的欢迎，在舞台上产生过较大影响。这一时期，揭露俄国官场黑暗的讽刺喜剧也出现新的繁荣景象，取得了重大成就。许多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果戈理讽刺喜剧的优秀传统，用怪诞夸张、滑稽巧合的喜剧手法，对俄国官僚社会的腐恶弊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这方面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是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的《巴祖兴之死》(1857)、苏霍沃—柯贝林的《往日的景象》(1858)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肥缺》(1856)等。

奥斯特罗夫斯基是五十年代后俄国戏剧文学的主要代表

作家。俄国有史以来的许多作家中，唯有他是终身只从事剧本写作的人。他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为俄国剧院提供了《大雷雨》(1859)、《没有陪嫁的女人》(1879)等近五十部剧作，创造了大约六百个各种类型的艺术形象。他把小商人、小官吏、城市贫民、家庭妇女、大学生、演员、工匠等平民阶层的人物搬上舞台，扩大了戏剧表现的范围，从更多的侧面反映了当时俄罗斯“黑暗王国”的现实生活，使这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有了更为丰富的主题内容。他的一些优秀剧作，往往通过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来展示人物细微的内心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心理冲突，因而曾被称誉为具有社会心理剧风格的作品。这种风格在屠格涅夫的剧作中有过独特的运用，后来在契诃夫的戏剧里，达到了更加完美的境界。奥斯特罗夫斯基对俄国戏剧发展所做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把俄罗斯民族戏剧大大推进了一步，使它真正在舞台上确立了起来。著名作家冈察洛夫在庆祝剧作家创作活动三十五周年的贺信里写道：“您向文学界奉献了一整套的艺术品，为舞台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世界。您独自一人盖起了一座戏剧大厦，虽然它的基石是冯维辛、格里鲍耶陀夫和果戈理奠定的。然而只是在您之后，我们俄罗斯人才能自豪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俄罗斯民族戏剧。”

继奥斯特罗夫斯基之后，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继续取得重要成就。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主要代表作家是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继承发展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在艺术上富有创新精神。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

卡列尼娜》、《复活》等概括了广阔丰富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众多的哲学、历史、道德、爱情、宗教等主题，大大开拓了艺术表现的广阔天地。在戏剧方面，他最著名的剧作是《黑暗的势力》(1887)。剧中描写一个富农家的长工，在恶势力影响下，为了占有财产，满足私欲，竟然谋杀两条人命，后来受到宗教的启示和良心的谴责，走上了自我忏悔的道路。作家借此指出，资本主义是腐蚀农民灵魂、制造犯罪恶行的“黑暗的势力”，只有依靠宗法制农民的道德力量才能战胜这种势力。这充分暴露出作家世界观中的严重弱点。托尔斯泰的作品深刻地表现了1861年以后到1905年以前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表达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和情绪，因而成了反映俄国革命的力量和弱点的一面镜子。

八十年代以后，俄国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工人协会在许多城市相继成立。特别是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俄国工人运动真正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起来。正是从这时起，俄国解放运动开始进入第三时期，即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这时批判现实主义渐趋衰落。由于西欧文艺思潮的影响和在无产阶级革命风暴中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的仇恨、惶恐、颓废情绪的浸染，象征主义等现代派颓废文艺猖狂一时，他们宣扬神秘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赞美剥削阶级腐朽生活，引导读者脱离现实。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坚持现实主义的进步方向，并在创作实践上取得杰出成就的是契诃夫。

契诃夫写了很多小说和剧本。他的独幕剧带有通俗笑剧的特点，能抓住生活中貌似平淡的喜剧性事件，予以夸张的描

写,讽刺、嘲笑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地主的鄙俗无耻。多幕剧则主要表现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抱负和现实环境的矛盾。有些作品如《海鸥》、《樱桃园》等,情节简朴平淡,人物的心理刻画细致深刻,在艺术上独具一格。契诃夫的剧作对当时俄国的舞台艺术进行了一次重大革新,从而使批判现实主义戏剧达到了新的水平。

二十世纪初,世界革命的中心从德国转到了俄国。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掀起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浪潮。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空前激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发展,俄国无产阶级的文学、戏剧也随之产生。1905年,列宁发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光辉论文,对资产阶级文学的实质作了彻底批判,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接着,列宁又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一文中提出了“两种文化”的学说。文学的党性原则和两种文化学说,为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俄国无产阶级文学、戏剧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是高尔基。他的早期作品揭露了沙皇统治下俄国社会的黑暗,反映了劳动群众要求解放的革命情绪。特别是1906年完成的长篇巨著《母亲》,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描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壮丽图景,勾勒了工人革命家的英雄形象,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竖立了第一块丰碑。为了利用剧场直接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高尔基在1905年前后还创作了《小市民》、《底层》、《仇敌》等戏剧作品。在《小市民》中,高尔基第一次塑造了一个现代产业工人形象,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仇敌》则描写了工人群众在党领导下由自发斗争

走上自觉斗争的道路，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的强大力量。这些剧作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为无产阶级戏剧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一开始就和十九世纪的俄国解放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反映了贵族革命、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和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这三个主要历史阶段的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对沙俄的专制农奴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表达了进步人民的理想和要求。而在无产阶级文学戏剧的奠基者高尔基的作品中，则为人民群众指出了一条为建设新生活而斗争的革命道路。俄国的现实主义戏剧，无论就其思想深度或艺术成就来说，都可说是世界戏剧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它对许多国家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和进步的戏剧运动，都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目 录

前 言 (1)

聪明误〔俄〕格利鲍耶陀夫著 朱维之译(5)

钦差大臣〔俄〕果戈理著 芳 信译(165)

大雷雨〔俄〕奥斯特罗夫斯基著 芳 信译(283)

黑暗的势力...〔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芳 信译(375)

樱桃园〔俄〕契诃夫著 焦菊隐译(501)

底 层〔俄〕高尔基著 芳 信译(591)

格利鲍耶陀夫 (1)

果戈理 (159)

奥斯特罗夫斯基 (277)

托尔斯泰 (369)

契诃夫 (497)

高尔基 (585)

格利鲍耶陀夫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利鲍耶陀夫(1795—1829)由于创作了《聪明误》(又译《智慧的痛苦》)一剧,被人们誉为“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他的剧本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被译成好几国文字出版,具有广泛的影响。

格利鲍耶陀夫出身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幼年时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好几国文字,十一岁进入莫斯科大学,六年内学完了文学、法学、数学三个系的课程,获得了文学副博士、法学副博士的学位。1812年,拿破仑侵入俄国,年轻的格利鲍耶陀夫出于爱国热情,毅然弃学从军。几年的军队生活,使他扩大了视野,进一步体会到俄国农奴制度的残酷、腐败和贵族上流社会的黑暗。四年后,他被调到彼得堡外交部任职。这时,首都进步的贵族青年正酝酿兴起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为宗旨的社会思潮,俄国第一批贵族革命者已经组成了秘密团体“救国协会”。这就是十二月党人的最初的活动。其中不少思想激进的十二月党人骨干分子,与格利鲍耶陀夫有着密切的交往。不久,格利鲍耶陀夫被派到波斯去当俄国驻波斯大使馆的秘书,在那里住了三年,开始写作《聪明误》。1823年,格利鲍耶陀夫回到莫斯科和彼

格利鲍耶陀夫

得堡休假,重新体验了剧本所要反映的生活。当时,十二月党人正在紧张地准备着一次贵族革命的暴动,格利鲍耶陀夫就在斗争激烈的气氛中,完成了《聪明误》。剧本写成后,沙皇政府不准其出版和演出,但剧作的手抄本很快地到处流传,配合了十二月党人革命思潮的宣传。1825年春天,格利鲍耶陀夫休假期满,回到高加索,未能亲身参加同年十二月十四日贵族革命的起义行动。这场暴动被沙皇政府镇压后,他曾因与十二月党人的密切关系遭到逮捕,关了四个月后因证据不足获得释放。1828年,格利鲍耶陀夫又被派到波斯去当大使,第二年的一月三十日,波斯发生袭击俄国大使馆的反俄武装暴动,格利鲍耶陀夫被当场杀害,终年三十四岁。

格利鲍耶陀夫从学生时代起就热心于戏剧活动,并尝试着编写剧本。他先后翻译改编或与他人合作写了《青年夫妇》、《自己的家庭》、《假装不信任》、《大学生》等剧,这些作品大都搬用了贵族沙龙喜剧和无聊消遣剧的老套子,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都没有多大的社会价值。

《聪明误》是在十二月党人贵族革命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剧本通过法穆索夫、恰茨基等正反两个方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的主要矛盾,对贵族世界的黑暗内幕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充分表达了贵族革命青年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情绪。

格利鲍耶陀夫在《聪明误》的创作中,采用了古典主义戏剧的一些传统手法,如全部剧情发生在法穆索夫家里(“地点的统一”),时间不超过一昼夜(“时间的统一”),戏剧事件围绕着恰茨基与索菲亚之间的爱情线索进行(“情节的统一”)。但